

私心，指的就是伊藤仁齋沒有領悟到東亞文明整體安全的大義。幕府親藩通過舜水之手來讚揚楠木正成，把天皇提升到了東亞文明的法原地位。錢教授提出的舜水旨在重建社會、重建儒學、重建東亞國際關係的三大使命，其實也是德川日本的課題。

徐教授指出，明末清初抗清志士「在明清易主，政治環境激烈變遷之後選擇走避他國。其中不是消極逃避外來政權的，即是積極抱持反清復明意識的國家認同者」（徐著，頁168-69）。問題是這裏的「國家」所指是明朝政權，還是明朝文化？抑或兩者兼有？朱舜水連南明政權也未必認同，他所認同的是王者的法原功能，當明朝政權消失以後，他相信日本可以延續明朝的道統。這

裏發生了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「創造性轉換」的課題。

錢著幾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來敘述舜水事迹的回傳故土，這是該書的又一個亮點。這裏面涉及到徐教授所說的，學術研究與政治訴求之間糾葛的問題。

徐教授在《新訂朱舜水集補遺》中指出，「朱舜水研究不僅是中日文化關係互動的研究，同時也是詮釋從近世到近代東亞文明發展史的研究」（徐興慶：〈自序〉，載徐興慶編著：《新訂朱舜水集補遺》，頁xiii）。從「東亞文明發展史」的角度來看，舜水在全球化時代到來之初，向日本朝野傳達了東亞文明整體安全的觀念。兩位教授都已經把東亞文明整體作為研究的對象，在研究典範上突破了我族中心主義的立言前提。

探尋「文革」真迹

● 王 颺



卜偉華：《「砸爛舊世界」——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（1966-1968）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，2008）。

卜偉華先生所著的《「砸爛舊世界」——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（1966-1968）》（以下簡稱《砸爛舊世界》），引用只註頁碼）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組織編寫和出版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》（十卷本）中的第六卷。該書以殷實的史料、深厚的敘述功底，為我們

卜偉華所著的《砸爛舊世界》以殷實的史料、深厚的敘述功底，為我們重構了1966至1968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重大事件，再現了那激情與荒唐並存的年代。

作者採用國內公開發行的地方資料彙編，對全國二十九個省、市、自治區的奪權活動分別進行介紹，不僅讓我們領略到文革時期各地奪權過程中的相似性與差異性，同時也讓我們體會到文革全盤的複雜性。

重構了1966至1968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重大事件，再現了那激情與荒唐並存的年代。

儘管文革早已為世人所唾棄，但官方出於各種考量，對於文革的研究還是採取了較為嚴格的限制措施。這些限制不僅使得有關研究難以深入，而且也阻礙了人們對於文革的進一步了解、認識與反思。特別是隨着時間的流逝，人們腦海中的文革記憶也開始慢慢淡化。面對這番情形，卜偉華憂心忡忡地寫道：

文化大革命發生於不遠的三四十年前，當時給中國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動亂與災難，過來人多以為文革的教訓是難以忘卻的。可是現在我認為，如果不抓緊進行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和文革史料的保存、搜集、整理、出版，用不了多少時間，文革中的許多事情都會被人遺忘的，……文革歷史的真實面貌也會逐漸模糊以至湮滅。（頁792）

正是懷着這種中國史家特有的「史不可滅」的歷史使命感，卜偉華造就了「中國第一部詳盡描述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和浩劫的好書，也是中國第一部真實反映文化大革命本來面目的好書」（頁xix）。

仔細研讀這本書之後，筆者認為該書有以下三大特點。

一 宏觀與微觀並重的治史視角

長期以來，文革史的研究都被圈在「宜粗不宜細」的指導框架之下。儘管有不少記述、研究文革的

論著出現，但這些作品或多或少犯有重宏觀（定性）而輕微觀（定量）的弊病。讀者只知道文革是場浩劫與災難，而對於其中的細節、具體的影響卻不甚了了。《砸爛舊世界》則在這一點上有很大的突破。作者在進行宏觀敘事的同時，對微觀歷史給予了高度的關注。

以文革中的奪權事件為例。以往有關文革的著述在敘述奪權事件的過程中，都會對上海的「一月革命」進行比較細緻的描寫，而對其他省、市、自治區的奪權活動就一筆帶過。有些文章儘管還會提到幾個較早開展奪權運動的省份，但在全國範圍內對各地奪權運動進行介紹的文章還不多見。《砸爛舊世界》一書則為我們彌補了這一缺陷。作者採用國內公開發行的地方資料彙編，對全國二十九個省、市、自治區的奪權活動分別進行了介紹。通過這些介紹，不僅讓我們領略到了文革時期各地奪權過程中的相似性與差異性，同時也讓我們體會到文革全盤的複雜性。

再以群眾專政為例。「砸爛公、檢、法」是文革中一條著名的口號，一般論者認為其提出是導致社會動蕩的一個主要因素，其結果是對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事業的公然踐踏，因此必須加以徹底否定。但對於這條口號所造成的具體後果，相關書籍鮮有論及；一般讀者因而不得其詳，往往會存在這樣一個疑問：一條口號能對社會造成多大的影響呢？《砸爛舊世界》則為我們解答了這一疑問。

在「群眾專政」的一節中（頁596-606），作者以詳實的數據資料為我們敘述了在「砸爛公、檢、法」口號

提出後在湖南道縣發生的大規模殺人事件。由於這條口號的提出，公、檢、法等國家機器不復存在，道縣屬下的「一些區、公社甚至大隊都組織起所謂『貧下中農最高法院』（有的叫『貧下中農高級法院』）」，並以這些機構的名義動員和部署殺人。作者在書中提供了以下這組數據：「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，歷時66天，涉及10個區，36個公社，1,590個大隊，共死亡4,519人，其中被殺死4,193人，逼迫自殺326人。」（頁601）這些觸目驚心的數據着實讓人體會到了「砸爛公、檢、法」這條口號的殺傷力及文革的殘酷性，而這僅僅是發生在一個小縣城的情況；至於全國範圍的情況，恐怕我們也不難從中窺測出些端倪。

二 客觀、公正地評價 文革人物

臧否人物一直是中國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，歷代史學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起到像「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」一樣的社會教化效果。因此，為了實現這種效果，一些史學家不惜背離歷史事實而刻意去追求這條道德評判標準。直至如今，這種現象仍然存在於文革史的研究之中。《砸爛舊世界》則對這種現象進行了摒棄，作者本着還歷史事實真相的原則，以史料為基礎對文革的人物進行比較客觀、公正的描述及評價。

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作用一直是文革研究中關注的熱點之一。中共官方史學秉承「為尊、賢者諱」的信

條，千方百計地把毛描述成一個受林彪、江青兩集團蒙蔽和擺布的受害者角色。除了搶奪有關評價毛的話語權外，官方機構還對能反映毛在文革中所作所為的資料進行了篩選。這對於研究毛在文革中到底起了甚麼作用是極為不利的。不過，卜偉華並沒有受制於這些阻礙，他通過辨析各種已公開的史料來呈現毛在文革中所起的作用。

1965年11月，姚文元執筆的〈評新編歷史劇《海瑞罷官》〉一文揭開了文革的序幕。對此文的醞釀情況，流行的說法都強調毛是被江青「說服」的。實情如何呢？卜偉華通過對「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和巴盧庫的講話」、薄一波組織編寫的《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》，以及《王力反思錄》進行了一番辨析後指出：「在點名批評吳晗的《海瑞罷官》這件事上，毛澤東是主動的，江青不過是毛的一個『卒子』。」同時作者又進一步分析道：

我們從毛澤東的性格特點上看，毛常自詡，他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。如果他認為不應該點名批判吳晗，那他也不會輕易地被人「說服」。細心的讀者還會發現，江青前往上海開始組織這篇批判文章的時間，正是毛澤東下決心「搞掉」劉少奇之後不久。（頁13）

由此，作者從史實出發並兼顧毛的個人性格特點，對毛在批判《海瑞罷官》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了澄清。

至於那些已被否定的文革反派人物，作者也沒有將他們打入另冊。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前中共中央

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作用一直是文革研究中關注的熱點之一。中共官方史學秉承「為尊、賢者諱」的信條，千方百計地把毛描述成一個受林彪、江青兩集團蒙蔽和擺布的受害者角色。

《砸爛舊世界》通過一份史料發現他人未曾發現的信息。通過作者的整理，我們不難發現毛澤東對於武鬥其實也是比較讚賞的。這與過去一些強調毛提倡「要文鬥、不要武鬥」的說法形成鮮明的對比。

政治局委員、國務院副總理、公安部部長謝富治。一般批評謝的文章都把提出「砸爛公、檢、法」的口號一事歸咎於他，而卜偉華則根據史料對這一事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他指出：

謝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現十分惡劣，對他的批判其實還很不深入。但問題在於：謝富治個人是不可能那麼大的膽量和能量提出「砸爛公、檢、法」的口號的，謝富治在當時的講話中就明確說到：他的講話「可能有錯誤。但總的精神，是有毛主席的指示作依據的。砸爛公、檢、法，毛主席當我的面講過沒有十次也有八次」。

作者還在註釋中引用了這樣一段材料：「1967年9月18日，毛澤東在湖南與黎原、華國鋒、章柏森等人談話時說：『我一聽到公檢法垮台，人就高興！聽說富治同志這次才說了幾句話。』」（頁599）由這兩段材料可見，謝富治在「砸爛公、檢、法」口號的提出上，僅僅是執行者而已，而毛才是真正的策劃者。由此可見，作者並沒有人云亦云，其背後所體現的史家求真、務實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。

三 敏銳、獨到的見解

在當前的文革史研究中，受到材料限制等因素的影響，研究者往往要在自己把握材料的基礎上對材料做出適當的解讀。與其他著作不同的是，《砸爛舊世界》在一些史

料解讀上有着比較敏銳、獨到的見解。

1968年7月28日〈毛澤東召見首都紅代會『五大領袖』時的談話〉是一份重要史料。對此，一般的解讀往往抓住毛對「五大領袖」的批評，來證明毛對他們已喪失了信心，而對毛和藹可親的一面避而不談。作者在《砸爛舊世界》一書中提出了另一種看法，認為：「毛澤東是對『五大領袖』進行了批評，而且有些話說得也很嚴厲，……但仔細研究毛澤東的談話記錄，可以清楚地看出：毛澤東對『五大領袖』的基本態度還是欣賞、愛護和寄予期望的。」（頁699）當時，毛批評、敲打這些領袖的主要目的，是要使混亂的局面盡快穩定下來，而不是對他們失去了信心。平心而論，毛對學生領袖的感情是相當複雜的，我們不能單從幾句批評的話語以及後來解散紅衛兵組織的結果，來臆測毛此時已對這些學生領袖喪失了信心。因此，一般的說法是不確切的；而《砸爛舊世界》的解讀比較切合毛當時那種複雜的心情。

還是針對這段史料，作者把其中毛澤東對武鬥問題的看法進行了整理：

從這次談話中還可以看出：毛澤東對武鬥問題有他獨特的看法。毛澤東認為，武鬥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現象，對武鬥要作全面分析。他說：「武鬥有兩個好處，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戰經驗，第二個好處是暴露了壞人。」毛澤東歷來不主張急急忙忙解決武鬥問題，他認為對武鬥採取「不怕亂，

不管、不急、不壓」的態度是正確的。他說：「現在工人去干涉，如果不行，把工人撤出來，再鬥十年，地球照樣轉動，天也不會掉下來。」(頁700-70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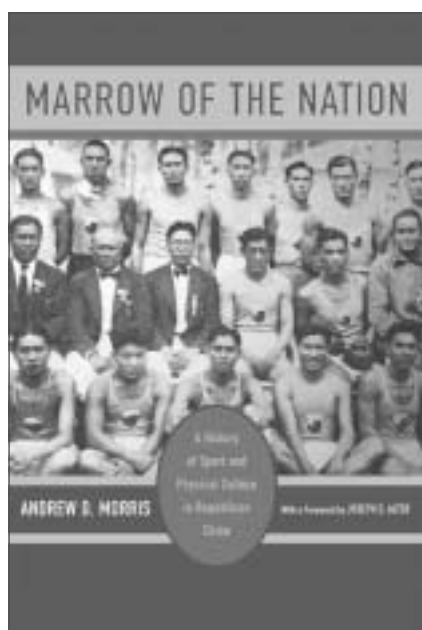
通過作者的這番整理，我們不難發現毛對於武鬥其實也是比較讚賞的。這就與過去一些強調毛提倡

「要文鬥、不要武鬥」的說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《砸爛舊世界》能通過一份史料發現他人未曾發現的信息，着實可見作者敏銳的洞察力。

除了上述這些特點外，《砸爛舊世界》一書還有用語凝練、敘述風格獨特等特點。總而言之，這是一部值得細細品味的好書。

近代體育與中國的現代化

• 劉 玄



Andrew D. Morris, *Marrow of the Nation: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* (Berkeley, CA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4).

2008年8月，第二十九屆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在中國北京舉行。中國，這個古老的國度，又一次贏得了世界的關注。中國運動員在這場運動會中取得的驕人成績(51枚金牌、100枚獎牌、高踞金牌榜首位)以及成功舉辦這場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奧運會，不僅成為中華民族自尊與自信情感的資本，同時也讓整個世界為之驚訝稱奇。《紐約時報》(*The New York Times*)認為，北京的好客和效率給來訪者留下深刻印象，同時也給全球觀眾展現了一個經濟和政治強國的興起。奧委會主席羅格(Jacques Rogge)在奧運會後也再次宣稱選擇北京作為主辦國為一個正確選擇(Jim Yardley, “After Glow of Games, What Next for China?”, *The New York Times*, 24 August 2008)。通過奧運盛會，中國向全世界展示一個正在變化和進步的形象。

源於西方文藝復興時期，以球類、田徑等競技運動為代表的近代體育，並非傳統中國土生土長的產物。傳統中國的體育文化，在社會中並未達到大眾普及的程度，而且與近代體育的發展趨勢漸行漸遠。